

# 中国社会进化论的文明战略 以及文化战略

赵京兰

**中文提要：**自严复受到（清日战争）战败的刺激，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翻译成《天演论》，进化论在中国得到了全面介绍。在《进化与伦理》中，严格区分了宇宙过程与伦理过程。在翻译赫胥黎的著作时，严复更多的时候是站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立场上对其进行重新解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将达尔文的有关自然现象的理论照搬到人类社会里。它的核心概念是适者生存。严复相信，社会进化论可以刺激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实际上，《天演论》被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且给他们提供了客观上理解世界的契机。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改革理论与革命理论大多以社会进化论为自己的根据。

严复以后，人们从两方面理解进化论，那就是文明阶段与文化阶段。严复与梁启超属于前一阶段，而后者则包括章炳麟和鲁迅。梁启超与严复强调了强化国家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为了对付西方，近代国家的建设极为重要。这里司法意义上的个人国民成为必要的存在，那就是克复部民状态的新民。当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梁启超认为以国民自觉为基础，应该对王朝进行改革，那么就有必要形成进化的主体。当时民智只不过是个还未得到启蒙的国家体系的单纯细胞而已。在现实当中，进化的主体是国家。结果，进化论与国家有机体说粘贴在一起。在严复和梁启超的进化论里，进化的主体从传统的“天下”转变为“社会”，后来成

为“国家”。

对于章炳麟与鲁迅而言，进化的主体是民族与人民。就像一个民族不应该被别的民族统治那样，他们认为，个人也不应该受到国家或其他人的统治。他们虽然使用进化论的语言，其实是对社会进化论进行根本的批评。如果整体上综合中国进化论的开展过程，就会发现进化主体的变化过程如下：天下→国家→民族→人民。

**关键词：**社会进化论，天演论，新民，民智，《进化与伦理》，文明战略，文化战略

## 一、如何看待中国和东亚的社会进化论？

社会进化论首先在西方得到形成之际，它作为非理性的理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种族歧视和优生学的排斥和区分上。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它又同时出现在各东北亚地区。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智慧的风气在东西方呈现出相同的面貌。但是，东北亚地区接受和展开社会进化论的过程却与西方存在着差异。比如说，有些地方引进社会进化论的初期，将“进化”解释成“进步”，这成为改革思想的根据所在。

根据各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引进主体的政治取向的不同，各国对社会进化论的解释也各异。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在东北亚地区强化国家主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社会进化论给“优胜劣汰”这一神话提供了思想根源。宏观上考察社会进化论后的东北亚近现代史，就会发现那些国家或社会里存在诸多非道德的、腐败的因素。在这些地区，至今为止都还未出现多元化的市民社会。有些人就把主要原因归结为 19 世纪末社会进化论的引进。这种主张难免过于简单。这是因为，在东北亚社会里我们一般提出来的那些问题，比如个人对国家的附属关系、以及对他者的极其吝啬的关怀等，这些并非是等到社会进化论以后才出现的，而是在它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诸多问题点。社会进化论的引进使得这种现象变得更加严重而已。

如果环境不同，那么对社会进化论的接受程度也会呈现出差异。比如，斯宾塞主张社会进化论应该以个人的竞争与活性化为目的。当韩中日三国引进社会进化论时，都把斯宾塞的这种理论视作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来看待的。但是，当这同一个理论融入到东北亚各国时，却出现了不同的功能以及结果。<sup>①</sup>具体而言，日

---

<sup>①</sup> 中国引进社会进化论时，翻译的原著并非是斯宾塞的书，而是赫胥黎的著作。这都是为了更有效地批评赫胥黎。但在翻译的过程里多多少少留有原作者的思想痕迹，这是难免的。

本主要将其视作是向外扩充的根据所在，而韩国和中国则主要看作是国家生存战略的思想根据。当日本接触到社会进化论时，主要关注两点：一是面向西方（强者）时，日本以弱者自居，强调适者生存；另一方面，当他们对待韩中两国（弱者）时，站在强者的位置里，强调弱肉强食。韩中两国则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局面，为了避免被淘汰，开始运用社会进化论。这一理论在日本成为对外扩张的思想根据，而在韩中两国，则成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引进社会进化论的时候，三国虽然都运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但是其展开过程却呈现出诸多差异。

在 19 世纪末，当东北亚被拉进世界资本主义里的时候分别引进了社会进化论。这一理论在东北亚地区被看作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战略思想”。东北亚的知识分子一般将这一理论视作是认识世界的普遍框架。他们以社会进化论的基本框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来认识世界。在现实里，人们自然将其看作是自强的含义。当他们意识到自强的重要性时，同时又认识到建设国民国家的必要性。社会进化论最终引发了有关国家国民的话题。<sup>①</sup>

虽说社会进化论是一种强权理论，人们也强烈意识到它的非道德性。但是恰恰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有目的、有意识地接受它。在 19 世纪末形成的全球化的世界体系里根本无法容忍道德性。社会进化论的引进并非偶然。如果有人提出如下问题：具有儒学理性的、道德性基础的东北亚地区，为何要接受非理性的、非道德的社会进化论？这种提问看起来似乎有些愚蠢。我们也可以说引进主体的政治倾向以及阶级利益使他们不得不那么做，其实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使得韩中两国别无选择。根据进化理论，西方属于具有普遍价值的优越的文明，而日本则为了赶超它，不断作出努力，最终成功。当东北亚地区面临危机时，人们不能继续

---

① 中韩两国与日本不同，他们两国开始考虑国民国家问题，并非是接触到西方以后的事情，而是以清日战争里的战败以及江华岛条约为契机的。国民国家其实意味着主权与领域，即主权的境界，而清日战争与江华岛条约恰好使人们强烈意识到这一点。虽说国民国家形成的必要性在于西方势力造成的危机里，但是其直接原因却是日本的帝国主义以及东北亚秩序的重组过程。（山室信一，《国民国家形成的三重奏与东亚世界》，任城模译，载《既是多个又是一个的亚洲》，仓批，2003。）

悠闲地用道德和名份等杆秤来衡量外来思想和文明。当时出现的民权论、自由论、国权论等诸多讨论，既矛盾，又互相折衷，结合起来，这与当时的局面不无关系。如果我们考虑到历史的现实性问题，那么对于社会进化论的探讨有可能会变得更加丰富。

以上从东北亚的角度简单分析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面集中讨论中国的问题。这里主要考察中国引进和开展社会进化论的过程，以及它如何介入到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里。与日本一样，中国也将社会进化论看作是形成“近代国家”和“国民”的思想前提，它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引进社会进化论的时候并非完全倒向“国民”问题。中国人将“国民”问题看作是西方的文明战略，对此非常反感。这种文化战略阶段出现在中国的社会进化论里。如果我们分别用“近代性”和“反近代性”来概括“文明战略”和“文化战略”的特点，那么严复（1854—1921）和梁启超（1873—1929）属于文明战略，而章炳麟（1869—1936）、鲁迅（1881—1936）属于后者。本稿则主要从社会进化论的引进与反作用这一脉络出发考察这些思想家。

## 二、斯宾塞与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以及中国

19世纪末中国刚接触到进化论的时候，主要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但是当严复要翻译进化论时使用的原著却不是斯宾塞的书，而是与其持相反立场的托马斯·赫胥黎（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在探讨中国社会进化论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这二人。

在185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否定神介入到人类历史当中，还否定了目的论。在这一点上，它与以往的进化论相区别。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看，进化论可以被理解为是进步概念的科学根据。如果将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说”运用到人类社

会里，那么它有可能会拥护那些在竞争里胜出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的可能性。

斯宾塞就将具有可能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功转化到现实里去。从 1852 年的《发达假说》到 1857 年的《进步：其法则和原因》，斯宾塞通过一系列的论文，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之前，斯宾塞就已经树立计划要将自己的进化思想普及开来。<sup>①</sup>从此，“进化”概念不再处于价值中立位置里，而是成为“进步”。

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核心理论包括如下概念，“生存竞争”与“适者生存”。这些理论将英国当时的个人主义正当化，还将追求成功的行为合理化。这些理论又强化了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者的立场。自由放任主义出现于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他们主张国家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财货、生产、分配的干涉，应该放纵那些以利己之心为基础的个人经济活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里最受瞩目的有机体理论，其焦点也放在了个人上。按照他的理论，有机体的目的就在于整体，细胞只不过是手段而已；而在社会里，个人是目的，社会却是手段。在有机体里，重点放在政体上，而在社会里，反而转到个人那里。斯宾塞认为个人不是为整体存在的，相反，整体为个人的幸福而存在。这种意义里的社会才会与国家相同。他进一步讲如果从政治角度出发考察社会，就变成国家。<sup>②</sup>

当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在社会里得到普及之际，托马斯·赫胥黎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在自己的演讲《进化与伦理》里，主要也是针对斯宾塞的。斯宾塞主张自然进化原理可以扩大到社会里去，赫胥黎则反驳说自然法则（cosmic process）与伦理规则（ethics process）的进化原理各不相同。

---

① 金德镐，《社会达尔文主义》，金荣英、林志炫编，《西方智的运动》，知识产业社，1994，579 页。

② 一提到国家，一般使用政府（government）这一术语，而并不使用“社会”。这成为 19 世纪英国社会学者的普遍认识。与此相反，在德国，则倾向于将社会与国家看作是相同的概念。从此，国家论开始盛行。

赫胥黎指出社会进化论的错误就在于“适者生存”（最合适的才能生存下来）这一模糊的用语上。适者（fittest）是指“最好的”，而“最好的”这一用语周围又弥漫着“道德的香味”。在赫胥黎看来，要想在宇宙自然里辨别出“最适者”，就得看条件。<sup>①</sup>“宇宙对社会进化的作用越大，社会文明越幼稚。社会的进步发生在一步一步遏制自己主张的过程里，伦理规则与自然法则是不同的。伦理的目的并不在于保存‘最适者’，而在于保存伦理上最好的。所谓‘伦理上最好的’，就是指善与德。为实践善与德，应该采取与宇宙生存竞争相反的行动。这里需要的是自我遏制（self-restraint），而不是毫无慈悲之心的自我主张。”<sup>②</sup>赫胥黎下结论说，社会伦理的进步并不在于对自然法则的模仿和逃避，而在于斗争。斯宾塞与赫胥黎虽然都是达尔文的忠实的继承者，但解释进化论的时候，互相持相反的意见。而这种相反的立场都通过严复的翻译和介绍，进入中国。在中国，托马斯·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是严复翻译使用的原著，这与韩日两国不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将在后面作详细说明。

### 三、中国的社会进化论和国民国家计划-文明战略

#### （一）对社会进化论的介绍和有选择性的解释：严复

严复介绍进化论的最直接原因就是 1895 年爆发的清日战争。在那次的战败以后，严复开始反思日本和西方变得强大，中国成为弱者的根本原因。严复认为西方的军事科技之所以如此发达，其根源并不在于形而下学，而在于西方思想和学术等形而上学里。他批评和拒绝洋务派（从对立的视角看待东西方）“中体西用”的思维方式。

---

<sup>①</sup> T. 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189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0.

<sup>②</sup> T. H. Huxleys, 1989, p80.

严格来讲，中国的进化论是从《天演论》开始的。严复的《天演论》是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思想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1894）。赫胥黎与斯宾塞相反，主张宇宙自然的进化法则与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则是相对立的，后者（人类社会）对于前者（宇宙自然）的斗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社会进步。严复在翻译的时候，站在斯宾塞的立场上批评了赫胥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将物竞（struggle for existence）、天择（natural selection）<sup>①</sup>、适者生存的原理运用到社会领域里，而他的社会有机体论则强调了个体之间的结合。严复认为斯宾塞的以上两种观点，恰好符合中国的实情。在全世界前所未有地陷入竞争之际，斯宾塞对斗争价值的强调，有助于挖掘中国的潜力。赫胥黎采取的是将人类社会规则与自然法则相对立的立场（胜天），斯宾塞则采取了用进化原理说明宇宙过程的方式（任天），而严复觉得后者更接近于将自然秩序与人类秩序连接起来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但是严复并非完全同意斯宾塞的观点。<sup>②</sup> 当时严复思考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而不是一种文化的中国。他觉得与生物有机体较类似的社会有机体，最鲜明地刻画出国家的形象。<sup>③</sup> 严复也同意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的观点，就像人由肉体和精神构成，社会也由力量与道德构成。<sup>④</sup> 但是解释个人与国家关系方面二人存在差异。斯宾塞主张经济个人主义和反国家主义，他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严复

① 严复将原著里的“struggle for existence”翻译成“物竞”，将“natural selection”翻译成“天择”，而“evolution”是“天演”。他之所以从传统哲学的范畴里进行翻译，不仅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哲学理由，主要原因还在于通过这种过程，他试图消解中国人对外来思想的抵触心理。当他直接介绍英国的学术思想时，并非使用日本的用语（进化，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等）。日本式术语在中国普遍流行开来是从梁启超（他长期住在日本）开始的。（手代木 有 儿，〈严复‘天演论’におけるスペンサーとハツクスリーの受容〉，《集刊东洋学》58，1987，66页。高田淳，〈天人之道と進化論—嚴復〉，《中國の近代と儒教》，纪伊国屋新书，1970，140页。）

② 当比较赫胥黎的原著和严复的翻译稿《天演论》时也可以发现这一点。（T. H. Huxley, 1989, p. 83. 严复，《天演论》论十七“进化”5册，1396页。）

③ B.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56.

④ 严复，《原强修订稿》1册，17页。

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理解斯宾塞的思想的，而是将其看作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来把握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还未形成能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起来的社会基础。斯宾塞主张个人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对此严复也持相同意见。但是斯宾塞主张应该通过对国家力量的限制，使个人充分发挥力量，对此，严复持反对意见。斯宾塞将社会看作是实现个人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严复则将个人视作是实现社会（国家）目标的工具。斯宾塞将产业型社会视作是终极目标，但是严复则关注军事型社会形态。斯宾塞主张社会一般从军事阶段的“强”进化为产业阶段的“富”。但是严复则无视这些阶段型进化，将“富”与“强”视作是相互作用的、统合的因素。

严复在有机地把握民、群、国家的时候（上下通）<sup>①</sup>，重点放在了群（社会）或群学（社会学）里。在个人，社会或国家当中他更加重视社会与国家。他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取决于民力，民智，民德这三个要素。<sup>②</sup>他关注的是综合了“民”（被统治者）的智，德，力的国力。严复只允许在国家生存的范围里个人才能拥有自由，这是一种国家主义。<sup>③</sup>当民还未具备智、德、力、自治能力的情况下，君主与圣人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sup>④</sup>他反对现在马上废除君臣制度。严复之所以主张君主与圣人的必要性，是因为按照弱肉强食之理论，在互相厮杀的国际政治关系里二者非常重要。在现实当中能够团结力量的球心体是君主与国家。

依据这种现实理论，严复还提出如下构思。他认为当时最迫切的是中国的富强问题，这有利于百姓的利益（利民）。他进一步提出，只有当老百姓具备智，德，力等各因素的时候，自治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当社会实现自治，老百姓才能

① 严复，〈国闻报缘起〉，《〈国闻报〉论文选集》2册，453页。

② 严复，《原强修订稿》1册，25页。

③ 对于社会有机体，严复并非受到斯宾塞的影响，而是受到孔德（Comte）的影响。孔德强调人们之所以努力发现社会规则，其目的就在于在社会里能够集体行动。而斯宾塞则强调其原因正是为了避免集体的行动。（Lewis A. Coser，慎镛厦·朴明圭译，《社会思想史》，一志社，1989，156页。）

④ 严复，《辟韩》1册，34页。在中国近代，严复最早提出对民众智德力的启蒙思想。

获得自由；当获得自由时，才能实现自利；当个人自求利益的时候（自利），社会才能实现利民。<sup>①</sup> 他开始关注广义的教育，提出了教育救国论。<sup>②</sup> 教育救国论里民智成为最重要的道德内涵，也是实现富强的前提条件，当民智得到开窍的时候，国家才会富强起来，那时民德才会得到提高。

## （二）社会进化论框架的形成以及国民国家计划：梁启超

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大致受到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严复的社会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本杰明·颀德（Benjamin Kidd, 1858—1916）的社会进化论，伯伦知理（Bluntschili, 1808—1881）和加藤弘之的国家主义等影响。梁启超在受到西方进化论的直接洗礼之前，一直从导师康有为那里受到启发，尤其是康有为的三世公羊学影响甚大。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传和《礼记》“礼运篇”，将历史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等。其中，“据乱”是指君主专制时代，“升平”是君主立宪制，在那里君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同时社会处于小康状态。“太平”是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大同社会。梁启超以这种传统的三世说为基础，接受严复的社会进化论，强调变法的必要性。

当变法运动失败以后，与革命派的对决当中，梁启超的社会进化论变得更加具体。它比严复所主张的社会进化论更带有强权的性质。梁启超主张：“天下只有强权，而绝无平权。权力都是人类自己求来的，而不是天赋的”<sup>③</sup>，他强调连天赋人权都是通过竞争获得的。这与加藤弘之在《人权新说》里主张的人权天赋说一致。其实加藤弘之与梁启超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联系。在日本，加藤弘之与福泽谕吉共同引进了西方的天赋人权说，这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根据。但是

---

① 严复，《原强修订稿》1册，27页。

② 将教育并非看作是民权的一部分，而看作是国权的创建。严复的这一教育论延续到梁启超那里。

③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饮冰室文集》（以下简称《文集》）2册 10卷，13页。

后来当加藤弘之接触到社会进化论以后，将“天赋人权说”说成是“妄想”。<sup>①</sup>梁启超与加藤弘之的思想变化途径非常相似。<sup>②</sup>

当从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改革）失败以后，梁启超开始摸索新的方法，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的根本原因里。他曾经提出：“在中国，最大的缺陷和最迫切的是有机体的统一以及强有力的秩序，而自由平等是次要的。这是因为只有当部民成为国民以后，才能享受国民的幸福。就像伯伦知理主张的那样，民约论虽然很适合于社会，但是它不适合于国家。如果错误运用民约论的话，国民就会被拆散，变成部民，但是部民决不会重新结合成国民。”<sup>③</sup>梁启超的这句话里充分体现他对国家和民的想法，而这些又是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具有有机的统一性与强有力的秩序的国家，是解决中国危机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优先处理的课题之一。创建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民。对于梁启超来说，创建国家与国民的问题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面对民族帝国主义的竞争，创建国家与国民的问题成为非常重要的目标。<sup>④</sup>这里部民指的是依据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群居状态的“民”。

梁启超认为民权问题首先应该从民的解脱（从奴隶状态解脱出来），即民智的启发开始谈起。民智决定部民与国民。中国社会的落后原因在于大部分人仍处于部民状态。国民应该具备独自开展政治的自治能力。其统合体则体现为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种国民，那么在帝国主义时代里无法保存自己。梁启超的启

---

① 加藤弘之，《人权新说》（《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自由民权篇），日本评论社，1967，359页。当加藤弘之要在思想方面转向之际，当时的哲学界里加藤弘之、矢野文雄、外山正一之间围绕着天赋人权说和进化论，进行了思想争论。详情请看船山信一的《明治哲学史研究》（ミネルウァ书房，1959）。

② 对于这一点，有必要考察中日两国的政治情况。韩国的申采浩与梁启超在思想方面有关联，前者接受了后者的国家主义的、有机体的社会进化论。申采浩与加藤弘之、梁启超不同，我们应该考察他怎样超越社会进化论的框架，解释事实。

③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文集》3册13卷，69页。

④ J.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10, p.116.

蒙思想“新民说”则关注如下问题：如何从部民形成国民？如何唤醒民（受奴隶支配）的自治能力，从而形成国家思想？他断定说通过人民觉醒以后的自治、自尊、团结（合群）、公德等，可以实现国家改革。民还未觉醒，他们虽然拥有天下思想和朝廷思想，但是缺乏国家思想。在梁启超看来，部民指的是那些虽然具有天下思想，但是不具备国家思想的、受启蒙之前的有很多缺点的民，而且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处于这种状态。这就是他眼里的中国危机的核心部分。

在梁启超全面接受社会进化论之前，先以卢梭的民约论为根据，构想出民权来。他将人民的自由理解成自然权，依据平等的契约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权限范围。他试图从卢梭的民权论里找出自己的论据。<sup>①</sup>卢梭从民的状态自身出发设定出自由和民权，但是梁启超则与民智的状态相联系起来考察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严复在讲进化论时强调了富强的前提条件民智，而这一概念深深地烙印在梁启超的心目中。<sup>②</sup>在梁启超的心里，卢梭的民权概念作为价值和原理，仍占据一定的地位。严复反对政治自由，<sup>③</sup>而梁启超则在自己的文章和翻译本《自由原理》（原著：穆勒的《自由论》。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序文里主张政治自由。<sup>④</sup>梁启超始终主张民权是通过对民智的启蒙而得到扩散的。

根据梁启超的思想，民智得到发展以后形成民权，那时自治能力也会产生。但是目前只有圣人和君主等少数人才能拥有自治能力。而且以君主为中心，国家

①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902)，《文集》2册 10卷，5页。

②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文集》1册 2卷，10页。

③ 当时共和论得到广泛的探讨，严复意识到舆论的氛围，通过《群己权界论》的绪论，辛辣批评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现在中国将严复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发起人。（萧功秦，〈当代中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

④ 拙著，《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探索》，Samin, 2003，第141页。由于这一缘故，萧功秦和余英时都将梁启超看作是激进主义者。余英时主张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变法都要求“全变”、“速变”。（余英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6-7页。）萧功秦评价说变法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危机表现得过于急躁，过于单纯地看待激进的改革前途，表现出毫无根据的乐观。（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再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31页。）

应该主导民智，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群”不再表现为社会，当面临列强时，群是保存国家、维持独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球心体，它是构成近代国民国家的中心。由此可见，“群”越来越远离社会，而更倾向于国家的含义。

梁启超最终如下整理出自己的立场：“卢梭的民约论有助于公司的建立，但是对于国家的创建，却远远不够。民约论里没有明确区分国民与社会。主张民约论的人们不太晓得国民与社会的区别，认为国民就是社会。这是民约论的缺点所在。其实国民与社会并非同一物，国民是‘一定不同’的整体，社会则是‘变动不居’的集合体。国民与国家打交道，而且根本无法离开国家。社会则只不过是‘多数私人’的结合体而已。”<sup>①</sup> 梁启超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里吸取到的是由国民的凝聚性和社会的分散性构成的社会结构。<sup>②</sup> 如果说国民与社会的差异就在于此，那么对于一直摸索从部民到国民的转变路径的梁启超来说，他从卢梭转到伯伦知理、加藤弘之，以及强调集团主义的颀德，这种转变可谓是必然的。按照梁启超的观点，对国民的创建优先于所有的课题，这又是解决中国危机的方法所在。严复和梁启超始终强调要建立国家与国民，这一课题出自于他们的危机意识里，即他们觉得面对西方强者，如果我们无法建立与他们相同的国家体系，那么就会遭灭亡。但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进行殖民地扩张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武器就是这种文明化战略，二者非常相似。

## 四、对社会进化论同一性理论的批评 和反近代性-文化战略

### （一）对社会进化论的反击以及反近代性：章炳麟

<sup>①</sup>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文集》3册 13卷，67-68页。

<sup>②</sup> 野村浩一，〈民族革命思想の形成〉，《近代中國の政治と思想》，筑摩书房，1964，177页。

章炳麟认为，以往的社会进化论者并非对充满矛盾的现实持批评的态度，而是承认其事实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章炳麟对他们进行道德批评，从而阐述自己的进化论。他从佛教的唯识论和齐物论出发寻找解决现实的方法。他依据唯识论和齐物论，提出“俱分进化论”，其核心内容在于道德上主张善与恶的并行，生活当中苦与乐的并行。<sup>①</sup>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社会进化论是不可逆的、是循序渐进的，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一种信仰。章炳麟则对这种单纯的理解提出质疑。如果说社会进化论是一种对强者的同一性理论，那么它会沦为殖民统治者的文明战略。章炳麟的“俱分进化论”正是抵抗这种文明战略的文化战略。

章炳麟进一步提出，社会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走向激烈斗争的不可逆的发展过程“现势态”，另一个则是可逆的过程“潜势态”。章炳麟还从民族性的二元结构来理解进化过程，一个是表面上的社会前进，另一个是贯彻到深处的退化。按照这种区分，中国民族正处于可逆的进化过程里的潜势态里。我们应该从进化的一般世界的单线结构以及中国社会可逆的二重性结构当中寻找善与恶并行的进化二元结构之根源。<sup>②</sup>他指出：“进化（或进步，原著是‘进’）本来是依据‘根识’的‘迷惘’而实现的，事实上并无进化（进）。按照常识，一切物质都不会自我增殖或减少。如果这里发生进化，那里会出现退化，根本无所谓进化。”<sup>③</sup>全世界人们所认为的进化，实际上属于“幻象”。<sup>④</sup>章炳麟对进化论的以上二元性解释，其实与赫胥黎对斯宾塞的批判观点类似。赫胥黎也主张“进化的通俗含义其实包括退化”<sup>⑤</sup>。

根据齐物论里庄子的相对主义，章炳麟认为本来一元的、单线性的进化过程分裂成两个部分、两种顺序，即文和野，它们分别按照一定顺序维持自身的均

---

① 章炳麟，〈俱分进化论〉(1906)，《章太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4卷，386页。

② 绪形康，〈清末進化論の思想的位置とその歸趨〉，《中哲文学会报》第9号，东大中哲文学会，1984，44页。

③ 章炳麟，〈四惑论〉，《全集》4卷，449页。

④ 同上。

⑤ T.H. Huxley, 1989, p.6.

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依据欧洲的价值观，吞并了世界。章炳麟的主张正是为抵抗帝国主义列强而提出来的民族主义。依据他的理论，当时中国处于“野”的位置，而西方则站在“文”的立场上强迫中国与之同化，中国应该反抗西方的理论。他提倡齐物论的相对主义或个体主义，用公理概念<sup>①</sup>来对抗变法派的想法。变法派主张应该对世界、国家、他人负责。庄子并非给万物赋予一定的标准，应该从个体的自我主张当中寻找物论之根源，并且站在自然，即天的立场，揭露自我主张的空虚性，消除是非，否定所有物质的整齐划一性。这里所谓天的立场，是指所有个体都具有多样性，它们既不会侵犯他者，也不应该受他者的侵略。庄子否定了强制性的价值标准或社会秩序。齐物论的世界是一种个体并存的，互不侵犯的自由世界。在这种世界里，个体本质上不会进行自我主张。当我们受到他者一定的强制或压迫的时候，抵抗这种压迫并且消灭掉，进而恢复原来的自由世界。章炳麟所提倡的齐物论的自由就是指在这种过程里出现的个体的主体性。

章炳麟否定了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压迫。这与梁启超的那种将民看作是为国家而存在的立场相对立。章炳麟将社会进化论者的如此观点解释成国家吸收个人，试图实现一元统治的意图。章炳麟否定国家的同时，主张进化的主体是民族与人民。个体的自觉就是对“我”的认识，基于自觉的个体主体性就是指从“我”的解脱，即自我否定。自我否定的意识对象是“我”，而“我”在客观上又被异民族、王朝权力、阶级所围绕着。要想实现自我否定，必须打倒围绕在自己周围的他者的强迫。目前“我”的客观产物体现为民族、权力、阶级，而进行自我否定的主体则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主体相一致。一方面，“我”和“解脱”等概念纯粹属于形式性的意识。为了贯彻这些，并且获得自由，客观上要消灭叫作他者的敌对者，并且消灭自己。章炳麟的“五无论”希望

---

<sup>①</sup> 公理是章炳麟所主张的‘四惑’之一，这里四惑是指公理，进化，唯物，自然。古代人将名分视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人则将以上四者视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章炳麟，〈四惑论〉，《全集》4卷，443页。）

消解国家、民族，进而消除乐趣、人类、众生、世界。<sup>①</sup>

章炳麟的想法并非被现实的危机所埋没，他试图通过对所有的社会矛盾、历史矛盾的扬弃来解决问题。那就得扬弃所有的自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竞争和斗争等。有趣的是，他主张的是拒绝社会进化论的进化论。他的思想过于理想化，无法摆脱观念的、抽象的水准。但是又由于理想性，民的意志（试图实现它）可以与历史的发展方向结合在一起。

## （二）消除强弱之分，主张平等主义的社会进化论：鲁迅

鲁迅的进化论虽然以《天演论》所强调的危机意识为出发点，但是对社会进化论提出质疑，可以说他超越了社会进化论。在他看来，社会进化论将人类的历史看作是生物不断适应环境的一个过程。鲁迅超越社会进化论的方法就在于否定强者与弱者，优者与劣者的存在方式，尤其辛辣批评了处于劣者地位的中国民族以及人民的奴隶性。

中国如今之所以面临危机，鲁迅从中国整体（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奴隶本性出发找答案。鲁迅认为，以往的社会进化论只将围绕在人类周围的环境视作是问题点，而并非把长期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从而被歪曲了的本性和国民性当作问题。鲁迅对社会进化论非常质疑。他主张，为了与世界列强竞争，人类比环境更重要。<sup>②</sup>这里人类是指具有个性与精神的人。<sup>③</sup>鲁迅指出进化后的人类当中具备心性的就是理想人类，是“精神界的战士”。“精神界战士”的终极任务就在于警醒民众。他们的过渡性任务就是在黑暗里找出民众的可能性，唤醒民众内心里流淌着的生命力。鲁迅在这些精神界战士与民众之间还设定了年轻人这一“历史中间人物”。<sup>④</sup>这里民众是指等待开导的对象。对于鲁迅来说，民众是无法信赖的对

---

① 章炳麟，〈五无论〉，《全集》4卷，429-443页。

②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册，54页。

③ 同上页。

④ 鲁迅，〈坟〉后记，《鲁迅全集》4册，56页。对于这一主题，可以参考柳中夏的〈有关

象。但是他也承认具有丰富想象力的神话和天地崇拜思想的中国文化之根本就在于农民（原文是农人）身上，而非士大夫。这说明即使鲁迅不信任农民，他只是不信赖现在的农民而已，而并非不信任他们的潜力和可能性。<sup>①</sup>因鲁迅而出了名的阿Q是民众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中这种民众得不到信赖。但是这又最终对鲁迅起到积极的作用，使他对他们产生感情。<sup>②</sup>

在鲁迅看来，民众无法信赖，而士大夫更不值一提。在现实中目前为止还未出现能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主体。所以他不得不假想出一个叫作精神界的战士，或英明的贤人。他觉得，如果不发生突然事件，我们无法期待民众的突然觉醒，只能将中国现存问题交给超人来解决。<sup>③</sup>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只有超人，才会使天下太平，如果超人不可能出现，贤人也可以。”<sup>④</sup>

鲁迅赞同变法派的观点，认为当前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富国强兵。但是其方法论上二者存在差异。鲁迅认为主管这些问题的主体应该是人，但是在现实里这种人还未出现而已。中国当前有很多还未觉醒的民众，而这些还未觉醒的民众是无法信赖的。他的这种判断恰好使其启蒙思想能持续下去。只有默认和承认民众，才能实践启蒙主义。鲁迅的进化论对个人的自觉和尊重，以及民众的自觉持怀疑态度。这与近代性课题具有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对社会进化论的认识一直在变化。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李大钊（1889—1927）的进化论。他虽然以章炳麟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但是对章炳麟持批评态度，他提出了自己的进化论。章炳麟提出从“野”的立场出发抵抗“文”所强迫的同一性问题是其主要的课题。这里“文”意味着民族。对此，李大钊的关注点并非局限于民族的心理，而更关注于人类的普遍心理的团结上。自

---

“历史中间物”的两种情况》这一短篇。（《鲁迅的文学与思想》第3届中国现代文学国际学术大会，1993，99页。）

①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23页。

② 拙稿，〈对鲁迅社会进化论的批评以及“民”的发现〉，《历史批评》1994秋。

③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21页。

④ 鲁迅，〈文化偏至论〉1册，49页。

由意志（无限的青春）是他进化论认识的根源所在。他还主张进化之路并不依靠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而是依靠弱者、被压迫者之间的互助，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相互扶助”是克鲁泡特金（Kropotkin, Pyotr Alekseevich）从达尔文那里引出的概念。克鲁泡特金主张无论是动物世界还是人类社会，并非靠竞争，而是依据互助实现进化。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混乱的根源就在于封建军阀的割据以及粘附在他们身上的诸多列强的势力，而这一概念就被理解为抵抗这些要素的民主主义或民族主义。人们把它看作是对抗弱肉强食这一“强权”的“公理”。李大钊也将互助概念看作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的希望。社会进化论成为拥护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理念，而相互扶助论却可以解救中国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危机。<sup>①</sup>

社会进化论者将竞争视作是“公理”，而对其反感的知识分子则将社会发展的动力“互助”视作是“公理”。在此后的思想史里，社会进化论由于它所具有的生存竞争属性，而面临被淘汰的危机。生存竞争与相互扶助成为贯通人类历史的两个相反原理。在中国历史长廊里，一时也出现过否定生存竞争，主张相互扶助才是革命的课题，才是进化目标的时期。这种问题与赫胥黎对斯宾塞的质疑是一脉相通的。相互扶助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成为可以与社会进化论对抗的最大的思想脉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给知识分子提供营养。

## 五、中国的社会进化论与东亚的近代化方式

本稿重点考察中国的社会进化论。结果发现中国与韩日不同，他们对社会进化论的认识并非只停留在文明战略阶段里，而是基于中国社会情况，对社会进化

---

<sup>①</sup> 当时李大钊甚至认为相互扶助论还可以补充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里所遗漏的道德性问题。李大钊之所以强调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改造，正是基于这种思考的。（拙稿，〈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初期的特点〉，《历史批评》1990 秋，277-278 页。）

论提出批评意见。对于这种意见和理论，本稿暂时称作文化战略。从社会进化论的认识上看，中国经历文化战略阶段，这与中国近代化类型的关联性，将来有待于研究。而且这一问题有必要通过韩中日三国的比较来解决。

在绪论里也提过，对东亚社会进化论的分析，成为在根本上考察国民国家问题的前提条件。应该分析国民国家何时，为何进行讨论，其必要性何在等问题。通过这种思考，可以引出脱国家认识的必要性，而且可以导出更紧张的、更具有说服力的脱国家讨论。考察最近的东北亚就会发现以韩日为首的学者们争先恐后地发表了后现代的视角的有关国家和国民的研究成果，这可谓非常鼓舞人心。超出民族和国家，研究东北亚的共同意识问题可谓非常迫切。但是这些问题不能只停留于正当性问题上，而应该具备现实意义，所以有必要从现实的理论出发接触国民国家。

对社会进化论的接受方式呈现出最早接触西方思想时的形态。通过对三国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考察对待西方的时候韩中日三国的不同之处。这种差异也许多多少少都会与三国的近代化方式有关系。

尤其是梁启超的社会进化论给韩国改新儒学者带来重大的影响，这已经得到证明。这样一来，梁启超的社会进化论对韩中日三国的思想起到媒介作用。梁启超处于韩日两国思想锁链的中心位置里。梁启超的社会进化论从日本吸取哪些内容，而给韩国带来何种影响，即韩国的社会进化论者从梁启超那里吸收到哪些内容，其结果如何等问题，这些都有必要继续研究。如果这些研究成功的话，那么研究加藤弘之、梁启超、申采浩这三位思想家的联系性也就成为可能。这里有必要对加藤弘之的著作，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申采浩的著作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与社会进化论有关、在韩国知性史里重要的课题。在韩国，引进社会进化论的途径有二，一个是通过日本，另一个则是中国。以往的研究表明申采浩等通过中国引进社会进化论的人们后来主要走向独立运动之路，而经过日本接受的人们则走向了与日本殖民地权力妥协的方向。如果这一结论可

靠，那么属于前者的思想家或运动家们肯定关注中国社会进化论里的文化战略阶段，有可能将其消化掉。

（作者系韩国 延世大学 国学研究院 HK 研究教授 / 姜雪今 译）

### 参考文献

- 《孟子》，《中庸》。
- 李 澐，《星湖全书》，首尔：骊江出版社，1984。
- 王拭主编，《严复集》全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1、2、3册。
-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3册。
-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姜义华外编，《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章炳麟，《廛书》，世界书局印行，1963。
- 鲁 迅，《鲁迅全集》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鲁 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鲁 迅，《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藤田正典、島本信子编，《新青年》(1-2卷)，汲古书院，1971。
-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中、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山室信一，《国民国家形成的三重奏与东亚世界》，任城模译，载《既是多个又是一个的亚洲》，仓批，2003。
- 金德镐，《社会达尔文主义》，金荣汉、林志炫编，《西方智的运动》，知识产业社，1994。
- 赵京兰，《鲁迅的社会进化论批评与“民”的发现》，载《历史批评》，1994 秋季。
- 赵京兰，《中国马克思主义初期特点》，载《历史批评》，1990 冬季。
- 柳中夏，《有关“历史中间物”的两种情况》，载《鲁迅的文学与思想》第3届中国现代文学国际学术大会，1993。
- Lewis A. Coser, 慎镛厦·朴明圭译，《社会思想史》，一志社，1989。
- 萧功秦，《当代中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载《二十一世纪》，1997。

- 余英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 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再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载《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 加藤弘之，《人权新说》（《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 自由民权篇），日本评论社，1967。
- 船山信一，《明治哲学史研究》，ミネルウア书房，1959。
- 手代木・有兒，《严复《天演论》におけるスペンサーとハツクスリ--の受容》，载《集刊东洋学》58，1987。
- 高田淳，《天人の道と進化論——嚴復》，载《中國の近代と儒教》，纪伊国屋新书，1970。
- 野村浩一，《民族革命思想の形成》，载《近代中國の政治と思想》，筑摩书房，1964。
- 绪形康，《清末進化論の思想的位罝とその歸趨》，载《中哲文学会报》第9号，东大中哲文学会，1984。
- T. 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189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B.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Philip C. Huang,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 J.R.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Th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Strategy on Accommodation of the Social Darwinism in Modern China

Cho, Keong-Ran

Darwinism was introduced on full scale in China by Yen Fu(严复). Stimulated by the los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894~95), he translated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into TianYanLun(天演论).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recognizes Cosmic process and ethical process in strictly different sense. Yen Fu re-interpreted quite a lot of Huxley's works in the standpoint of Spencer's social-Darwinism. Spencer's social-Darwinism applies Darwin's theory on natural phenomena to the human society. The main idea here i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Yen Fu believed that social-Darwinism could stir a sense of crisis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 In reality, TianYanLun(天演论) was accepted by mo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and allowed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objectively. Most of the theories of re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that came abou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bases themselves on social-Darwinism.

After Yen Fu's introduction, Darwinism was developed in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Darwinism and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nationalism'.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ers of this stage were Yen Fu and Liang Qi-chao(梁启超). The second stage wa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xpention of Darwinism'. Zhang Bing-lin(章炳麟) and Lu Xun(鲁迅) can be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stage.

Yen Fu and Liang Qi-cha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a state. This was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as a center of correspondence against the West was necessary. Thus, the existence of a citizen in the judicial sense was required. That was the ‘XinMin(新民)’ overcome by the state of ‘BuMin(部民)’ .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BianFa(变法) movement’ Liang Qi-chao thought that the reform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wakening of the citizens. He also thought that in order to do so, the main body of evolution had to be created. Yet, the citizens in the situation where ‘MinZhi’ was still not developed was considered to be only simple cells in the system of state. In the realistic view, the state was understood to be the main body of evolution. Here, Darwinism and the theory of the organic state adheres. In Darwinism of Yen Fu and Liang Qi-chao, the main body of evolution transformed from ‘TianXia’ to ‘society’, and furthermore to ‘state’.

To Zhang Bing-lin and Lu Xun, the main body of evolution are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 As one nation can not be ruled by another, it was understood that an individual should not be ruled by neither the state nor another individual. Although such an understanding is expressed in the language of Darwinism, in reality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fundamental criticism on social-Darwinism. In wrapp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Darwinism in China, the subject of evolution can be said to progress eventually from ‘TianXia’ → state → nation → people.

**Key Words:** Social-Darwinism,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TianYanLun(天演论), XinMin(新民), MinZhi(民智)

